



伟大的经济学家系列译丛

Grandes routes de trafic internationale
Sous-Commission des Postes Télégraphes
World map of major arteries

GRANDES ROUTES DE TRAFIC INTERNATIONAUX
MAIN INTERNATIONAL TRAFFIC ARTERIES



GUNNAR
MYRDAL

纳纳·缪达尔

[美]威廉·巴伯 著 苏保忠 译

华夏出版社

GUNNAR
MYRDAL

纳纳·巴达尔

[美]威廉·巴伯 著 苏保忠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缪达尔/(美)巴伯著;苏保忠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8

(伟大的经济学家系列译丛)

ISBN 978 - 7 - 5080 - 5308 - 0

I . 纳… II . ①巴… ②苏… III . 缪达尔, K. G. (1898 ~ 1987) - 经济思想 - 研究 IV . F091.3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34206 号

William J. Barber: GUNNAR MYRDAL

Copyright © William J. Barber 2008

First published 2008 by PALGRAVE MACMILL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本书英文版由 PALGRAVE MACMILLAN 于 2008 年出版。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 PALGRAVE MACMILLAN 授予华夏出版社, 版权为华夏出版社所有。未经出版者书面允许,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08 - 1055

纳·缪达尔

[美]威廉·巴伯 著

苏保忠 译

策划编辑: 陈小兰

责任编辑: 李欣利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圣瑞伦印刷厂

装 订: 天津武清区高村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70 × 970 1/16 开

印 张: 11.5

字 数: 170 千字

定 价: 32.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这是一本关于 20 世纪一名最具创造力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巨擘的传记。就本书而言，其内容不是着重于缪达尔的个人生活细节，而是着重于他的经济学思想的形成、演进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目前，还没有一本全面常规的纲纳·缪达尔传记。不过，已有两本优秀的书籍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空缺，这两本书分别是斯赛拉·博克的《埃娃·缪达尔：一个女儿的回忆录》和沃特·A. 杰克逊的《纲纳·缪达尔和美国的良心：社会工程和种族自由，1938—1987 年》。

我非常感谢斯赛拉·博克，她不仅仔细阅读了本书手稿，还让我分享了她对她父亲思想的了解。感谢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的行政主管达尔文·H. 斯达普立顿，他让我引用他们的收藏资料。我还想向斯德哥尔摩的文化部门表达感谢，感谢他们授权允许我使用《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的选粹。

我衷心感谢安娜·安可·巴隆的帮助，感谢她为我翻译瑞典语文献以及在准备打印稿时所给予的技术支持。感谢卫斯理安大学董事们的项目拨款，正是这项拨款使得本书准备出版过程的经费有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我还要进一步地说明，我对纲纳·缪达尔的了解是从 1968 年出版 3 卷本的《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开始的，他本人是南亚发展研究小组的成员之一。

我最应该感谢的是保罗·斯特里顿，我长期的同事和朋友，他的批判性眼光使我的书稿得以完善。我谨以此书献给他。

序 言

为什么纳纳·缪达尔能入选经济学领域中的思想巨擘之列？其资历让人印象深刻。缪达尔独有的创造性和深刻的洞察力使他的事业令人关注。他的其他品质，特别是他宽广的学术视野和高深见地，也同样让人瞩目。

作为大家熟知的斯德哥尔摩学派的年轻一员，他以其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为经济理论所做出的贡献而第一次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的博士论文（已用瑞典语发表）是纯微观经济理论的一次尝试，在论文中，他研究了特定市场条件下未来变化预期对价格、利润和资本价值的影响方式。此后不久，他开始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宏观经济理论问题，特别是货币环境的稳定性或其他方面。他在这方面的著作于 1931 年以瑞典语出版，1933 年以德语出版，直到 1939 年，才用英语出版了《货币均衡论》一书。预期的未来状况的作用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焦点，具体体现在他对预期储蓄和实际储蓄以及与投资之间的区别的论述上（在译者的帮助下，这一点在 1933 年的德文版中变为 *ex ante* 和 *ex post*）。缪达尔的这些概念构成了凯恩斯于 1936 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分析的核心内容。如果在 1936 年前英语读者能够读到他的作品，那么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有趣的推断：是否应像把在大萧条中产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革命称为“凯恩斯主义”一样，也把这一理论革命称为“缪达尔主义”。

缪达尔的事业的第一个阶段包括一篇有关主流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将隐含的价值判断包含在其概念框架

之中，这其中包括政治偏见。缪达尔论证了经济学理论中关于价值中立无罪的主张是错误的。因此，对那些坚持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科学的经济理论家应持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这篇研究于1930年以瑞典语出版，1932年又以德语出版。1953年，取名为《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的英译本出版，并被持续而广泛地引用。他对偏见的揭露在他所有的成熟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当缪达尔作为一名政治经济学家开始致力于有关财政管理和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时，他的事业进入了第二阶段。作为瑞典财政部的一名顾问，他在1932年发表了关于应对经济萧条政策的长篇备忘录。1936年，他作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一名成员当选为瑞典议会上院议员。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还同他的妻子埃娃·缪达尔发表了一篇关于分析限制人口增长的经济后果的主题研究。这项研究反过来又使他们夫妇二人制订了一项扭转瑞典人口下降的重大计划。这项计划相当于瑞典社会福利的政策蓝图。

1938年，当缪达尔应邀到一个美国基金会去主持一项有关美国黑人问题的研究时，他又开始了他的全职学术研究生涯。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围绕一种新的分析构想展开的，这一分析构想就是存在于理想和现实间的紧张关系。所谓的理想是在他所描述的“美国的信条”中呈现出来的，它呼吁社会中所有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和机会。这种理想包括在独立宣言和宪法的官方辞令之中。然而，20世纪30年代美国种族关系的现实恰好完全相反。在这种不匹配的情况下，他认为理想应成为推动积极变革的一种力量。这种学术策略显然与他的预期方式会对价格形成以及储蓄与投资决策产生影响的分析相一致。在此情况下，他开始用其“神笔”来作“学术巨画”。其神笔即是一种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上的方法，这个方法超越了人为的横亘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以及历史学分析之间的界限。这幅“学术巨画”就是于1944年问世的《美国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他在其中的观点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有关美国窘境的讨论为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公共设施中实行种族隔离为不合法的决定提供了理论支持。

在 1943 – 1947 年间，缪达尔开始以其专业技能致力于公共活动。他在瑞典议会重新任职，即当初他前去美国研究黑人问题时辞去的职位。在 1945 – 1947 两年间，他在瑞典内阁担任商务部部长。在接下来的十年间（1947 – 1957 年）他是一个新成立的联合国组织——欧洲经济委员会——的创始人，该组织坐落在瑞士日内瓦。在他的领导下，这个组织开始对战后欧洲经济环境展开基础研究，目的是为欧洲各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信息。在欧洲经委会的十年中，他又开始从事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他的学术性工作是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提提出挑战。

当缪达尔离开欧洲经济委员会时，他开始了另一项重要学术研究，这一研究又花费了他十年时间。这是一个有关南亚新型独立国家的发展问题的系统调查。在对美国黑人问题的研究中，缪达尔显示了对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极大热情。这种热情在他的新作——《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中得到了深化和发展。这部分三卷的著作（其中包括 16 个附录）是对那些关于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前景的传统观点的一个正面抨击。缪达尔的独创性以及他敢于向传统观点挑战的精神再次得到展现。

纵观他的事业，纳纳·缪达尔是一个具有超强分析洞察力的创新者。至少，他愿意以交叉学科和跨域领域的方式去拓展他的探索范围。

目 录

前 言	1
序 言	3
第 1 章 开端及早期学术影响	1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瑞典经济学的状况	3
研究生阶段的经济学研究	8
第 2 章 早期对正统的挑战：	
《经济理论发展中的政治因素》（1930 年首次发表）	11
核心讨论	12
对两个应用实例的批评：	
对消费者行为和公共财政的研究	16
作品的接受程度	20
第 3 章 构建宏观经济动态理论：	
货币均衡论（1932、1933 和 1939 年版）	23
货币均衡论的框架结构	25
货币政策的角色	28
成果的评估	30
反 问	34
第 4 章 20 世纪 30 年代构建反周期的财政政策	37
在失业委员会的工作	39
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实施（1933 – 1936 年）	41

关于谁先谁后的再一次论战	45
一个明显的遗漏	48
第5章 20世纪30年代瑞典人口问题和社会政策	51
戈德金演讲的争论核心	52
可行政策的回应	55
贯彻施政纲领	57
合理人口政策的黑暗面	58
若干类似的情况	60
第6章 美国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	63
背景	64
准备工作：阶段I	66
在瑞典的一段高产的间歇期	68
起草终期调查报告	70
百科全书般的《美国困境》	74
初期接受程度	76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及20世纪70年代的突变	80
重访《美国困境》？	83
第7章 任商业部长时期为战后瑞典（1944—1947年）	
制定经济政策	85
评估战后美国经济前景	86
培养瑞典观念	88
作为内阁成员阐明瑞典的对外经济政策	90
基本原理	91
一点讽刺的意味	92
第8章 作为国际公务员及对国际经济的研究（1947—1957年）	
.....	95
欧洲经济委员会的目标和职能	96

欧洲经济委员会早期的活动	97
“闹钟”在运转	99
调查和计划部门其他方面的工作	102
成就的评价	103
对国际经济的进一步研究（1956—1957年）	109
对欠发达世界的关注	113
一些反应	115
第9章 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	117
《亚洲的戏剧》的诞生：研究的第一阶段	118
对工作价值前提的要求	119
中期修正：关注观念性批判	123
观念性评判：引用示例	125
一种制度性方法	128
经济政策思考的框架	131
最初西方的接受度	134
一些亚洲的声音	137
重访《亚洲的戏剧》	139
一个可能的相似情况？	141
第10章 20世纪60~70年代对贫富国家经济政策的建议 …	143
《富裕的挑战》的背景	143
缪达尔对美国词语的贡献	145
世界贫困的挑战：	
一个世界反贫困计划大纲（1970年）	147
规定发达国家的责任	151
尾 声	155
译后记	161
参考书目	163

开端及早期学术影响

纳·缪达尔于 1898 年出生于瑞典达拉纳省。他的出身卑微：他的祖先三个世纪以来都是农民。不过他的父亲脱离了这种传统的职业模式。虽然只接受了很多的正规教育，但他的父亲却是一个成功的几乎是自学成才的建筑从业者，尤其是在火车站的建设方面。他的妈妈接受的正规教育也很少，她是个尽责的路德教会教徒。和他们的同龄人一样，在瑞典的学校，学生们必须参加所谓的“基督”计划，年轻的纳纳·缪达尔和他的三个年幼的兄弟姐妹就是在那种教育理念下成长起来的。成年后，缪达尔背离了他原来的信仰，即便如此，圣经的寓意对他的思维方式仍产生了影响。

在缪达尔六岁时，他的全家移居到斯德哥尔摩。尽管居住地点发生了改变，但他们仍保持着在达拉纳时的传统。达拉纳省位于距其有 250 公里左右的首都的西北部，它在瑞典历史上有着光荣的地位。险要的地形条件使其在瑞典人民为保卫自己以及民族独立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 16 世纪，达拉纳省抵御了丹麦人的人

侵，并为古斯塔夫·瓦萨组织国内力量进而解放瑞典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援助。这里的人民为他们坚定不屈的性格而骄傲，为他们追求独立的坚强决心而自豪。在其一生中，缪达尔都为他与达拉纳的传统有缘感到自豪。

缪达尔的青少年时光是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所很好的公立高中（紫檀瑞尔）度过的。1918年，他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学习法律。1919年夏，缪达尔同一个女人的结识使他的事业开始转型。她就是年轻漂亮的埃娃·蕾玛。事业上充满雄心壮志和强烈好奇心的埃娃·蕾玛对她的家庭不能为她的追求提供更多支持而感到沮丧。她的父亲虽是一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但他却不完全欣赏她的能力；而她的母亲，一个每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对她也没什么特别同情。她父母的态度在那时的瑞典是很正常的：人们都习惯地认同大多数女人就应在家里做家务（个别情况除外），而接受高等教育则是男人们的事。

那些年中，纳纳·缪达尔和埃娃·蕾玛（1924年嫁给纳纳·缪达尔）之间的合作硕果累累。对埃娃而言，与纳纳的合作是她的一次思想上的解放，这也成为她成功获得心理学学位的催化剂。对纳纳来说，由于埃娃参与过社会民主党的青年运动，因此，与埃娃的合作也使他对社会时弊的观察有了更深的认识。

1923年，纳纳完成了他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律专业的学业。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自己不适合从事法律职业。他后来总结说，律师生活难以满足他对了解社会如何运作的强烈愿望。于是在埃娃的鼓励下，他决定在经济学中进行深造。正如他后来写道：

1923年春，我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拿到了法学学位。但那时我的精神完全被压垮了，而且感到十分沮丧，是埃娃拯救了我，她建议我应该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因为它更像自然科学和数学。她给我买了古斯塔夫·卡塞尔的《社会经济理论》，我发现其中的部分内容有些难以理解。但是，当现在再翻读那本旧书时，我意识到我以前的怀疑颇为正确。后

来，我督促自己阅读了 1899 年的瑞典《金融学报》的所有文章。^①

20世纪20年代中期瑞典经济学的状况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对所有专门从事经济学的研究者而言，斯德哥尔摩是个非常好的地方。瑞典很小，当时仅有大约六百万人口，但这其中却包含了经济学领域中的大批璀璨的明星。如果根据人均比例来计算，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与瑞典拥有国际地位的经济学家数量相媲美。

在同时代的人眼里，他们中最突出的便是古斯塔夫·卡塞尔，他在 1904 ~ 1933 年间担任斯德哥尔摩大学的首席教授。他确实是公认的 20 世纪 20 年代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在熊彼特看来，卡塞尔是“20 世纪 20 年代科学界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无论他的评论者（包括我自己在内）说什么，他确实如此”。^② 他的名气来自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货币状况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他坚决倡导金本位的恢复，并毫不让步。除此之外，他关于均衡发展状态的必要条件的讨论，即他认为收入的增长率与资本储蓄的增长率相一致，被认为至少是 15 年内都具有预见性的重要见解，后来的哈罗德 - 多马增长模型证明了这一点。^③

卡塞尔编写的教材《社会经济理论》拥有多种语言的版本，并受到许多国家读者的喜爱。他是一个著名的评论家，经常在主

^① G. 缪达尔，韦卢皮莱·库马拉斯瓦米引用于“纳纳·缪达尔对经济学理论贡献的反映”，《纳纳·缪达尔和他的著作》，吉斯·多斯特（Gillis Dostaler），丹尼·艾斯亚（Dianne Ethier）和劳伦特·列佩兹（Laurent Lepage）编辑〔蒙特利尔：丰收之家出版社（Harvest House），1992 年〕，第 133 – 134 页。

^② J. A. 熊彼特，《经济分析的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1954 年），第 1154 页。

^③ 卡塞尔在这点上的原文的英文版由 P. 斯特里顿翻译，他是《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纽约 20 世纪基金会，1968 年）第三卷附录 3 的作者，第 1969 – 1970 页。

4 纳纳·缪达尔

流媒体上对经济问题作出评论。而作为大学老师和讲师，他是一个具有重要影响且能够赢得包括那些不同意他的保守政治观点在内的学生称赞的人。尽管在政治上没有直接接触过，但他和缪达尔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则讣告中，缪达尔热情赞扬了卡塞尔一贯鼓励学生和同事的能力以及他对最高水平学术研究的奉献精神。^① 缪达尔尊敬卡塞尔还因为“他处理经济问题时拥有一种健康的现实主义精神、一种力图避免纯粹哲学思考的愿望和他尊重事实及数据的态度”。^②

卡塞尔的国际影响的一个方面能从一个为纪念文集做出过贡献的经济学家的名录上看出来，他也是在这一光环下从斯德哥尔摩大学退休的。这个名录上经济学家来自于 14 个国家，这些国家是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瑞士、比利时、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法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荷兰和美国。除此之外，还有两份来自受聘于联合国秘书处的经济学家们的提议。毫不奇怪，瑞典第一代的经济学家的全部成员（包括缪达尔）都位列其中。更令人吃惊的是，仅美国就有 12 位贡献者，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美国的贡献者名单让人印象深刻：詹姆斯·安吉尔（哥伦比亚大学），J. M. 克拉克（哥伦比亚大学），约翰·R. 康芒斯（威斯康星大学），保罗·道格拉斯（芝加哥大学），弗兰克·格雷厄姆（普林斯顿大学），阿尔文·汉森（明尼苏达大学），雅各布·霍兰德（霍普金斯大学），埃德温·W. 甘末尔（普林斯顿大学），富兰克·奈特（芝加哥大学），欧内斯特·M. 帕特森（宾夕法尼亚大学），E. R. A. 塞利格曼（哥伦比亚大学）和卡尔·斯奈德（纽约联邦储备银行）。^③

^① 缪达尔，“纪念古斯塔夫·卡塞尔”（1866 – 1944 年），英文版由 G. 俄林翻译，《牛津大学经济统计月报》，25（1963 年 2 月），第 1 – 10 页。这则讣告最初发表于瑞典的《经济评论》，1945 年 2 月。

^② 缪达尔，《社会理论的价值》（伦敦：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出版，1958 年），第 242 页。

^③ 参见《纪念古斯塔夫·卡塞尔的经济学短文》（伦敦：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33 年）。

尽管卡塞尔很有威望，但他的经济理论仍含有一些个人偏见。例如，他拒绝承认需求理论的边际效用法，就此他受到了全面批评（应该指出，缪达尔在这一点上完全吸收了卡塞尔的观点），卡塞尔坚持把相似购买力来作为对外汇汇率的解释也成为被批评的目标之一。

另一个令人敬畏的是克努特·维克塞尔（1851—1926年）。不幸的是，其创造力直到他去世后才被人们广为接受。他是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构想的先驱之一，他最为著名的成就与他对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论述有关，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可以归结到市场利率和自然利率的不同上（所谓自然利率是指借贷资本的需求与储蓄的供给相等，也就是投资和储蓄一致时的利率就是自然利率）。当市场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时，资本支出就会产生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如果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经济体制就会受限于紧缩的压力。价格水平的稳定只有在这两个利率一致时才能实现。维克塞尔的学说还蕴含着更深的含义。不能期望偏离的平衡能够自我校正。相反，它可能会引起更大程度的偏离。这个结论反映了维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即原始干预有自身放大的固有趋势。在他去世后，随着大萧条危机的出现，他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验证。（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成熟起来的包括缪达尔在内的年轻一代的瑞典经济学家认为，他们自己是新的“维克塞尔主义者”，他们也被认为是斯德哥尔摩学派的成员。）

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与维克塞尔同时代的人却不接受他在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原因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看不惯维克塞尔另类的生活方式（很多方面触动了中产阶级敏感的神经）。他宣扬新马尔萨斯人口论，公开谈论保证容易获取避孕用品的重要性。但是这还不是全部：他拥有事实婚姻，但却拒绝发誓对国王忠诚，他还认为瑞典对俄国侵略的防御是无用的，而且应该放弃军队的设立。在他老年时，即在1901年，维克塞尔在隆德大学获得了教授职位，一直到1917年他退休。之后他移居到斯德哥尔摩，学术活动方面依然活跃，是当地经济俱乐部的会员，有时还担任政府顾问，还

6 纳纳·缪达尔

是研究生们的非正式顾问。在缪达尔的研究生时代，维塞克尔对他的经济思想有很大影响，不过没有事实证明他们两个人互相认识。^①

在瑞典国外很少有人知道大卫·戴维森，但在国内他却是个极具影响力的人。他从 1889 ~ 1919 年退休一直担任乌普萨拉大学的教授，他对货币问题的评论被当时很多人所欣赏，但是，这些人仅限于瑞典国内（因为他的文章只是在国内发表）。作为 1899 年问世的瑞典首个经济杂志——《金融学报》的创始人和主编，他为该杂志做出了根本性贡献和努力（该杂志于 1965 年更名为《瑞典经济学》并以英文出版，1975 年，它又被更名为《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杂志》）。戴维森的新举措在于将杂志作为学术交流的一个主要工具，进而使本国经济研究能与其他国家的先进理论保持同步。^②

“群星”中的年轻成员——伊·菲·赫克歇尔（1879 – 1952 年），是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经济史教授。他也是个有才干的经济学家：他于 1919 年发表的文章形成了后来为大家所熟知的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的经济学基础，该理论认为，国家出口倾向于使用其相对充足要素的产品。在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坚持要求撰写经济史时要对理论给以特别关注。尽管他编写了让人高度重视的瑞典史，但他在国际上最著名的作品却是对重商主义的经典研究，它于 1935 年被翻译成英文。

高斯达·巴格是这个团体中最年轻的成员，他于 1921 年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其任务是推进社会政策的专业研究。

^① 维克塞尔多彩的事业主要记录在 T. 加仑特为他撰写的传记中。参考 T. 加仑特《卡努特·维克塞尔的一生》（斯德哥尔摩：Almquist and Wiksell 出版社，1958 年）。

^② 开展经济学专业期刊在 19 世纪后期十分流行。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从 1890 年开办了《经济学杂志》。在美国，第一波创建期刊的浪潮与大学急切促进新成立的研究生教育课程相联系，例如，《经济学季刊》（哈佛大学，1885 年）；《政治科学季刊》（哥伦比亚大学，1886 年）；《政治经济学杂志》（芝加哥大学，1892 年）。美国经济学协会于 1885 年成立，但直到 1910 年才创建了自己的杂志——《美国经济评论》。

由于他生性保守，所以不久后他就成为了保守党的领导人。由于他与维克塞尔的激进主义观点相左，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他与其他经济学家的交流受到了限制。然而，他在获取由纽约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一个关于瑞典国民收入、工资和生活费用的大型历史研究项目中表现得非常坚强。缪达尔后来也参与了该项目的部分研究。

虽然他们的专长各不一样，但他们每个人又都与众不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有共同的政治信仰。卡塞尔、戴维森和巴格是保守派，他们通常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表示怀疑。赫克歇尔也有类似的倾向，毕竟，他关于重商主义的研究已经成为谴责政府试图控制经济的错误做法的说教。维克塞尔是局外人，他代表社会民主，支持社会主义首创的实验。维克塞尔努力使自己同卡塞尔划清界限。1919年，他在《金融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卡塞尔的社会经济理论的谴责性评论。卡塞尔在实质性问题上犯有错误，例如，他因拒绝接受边际效用的概念而受到尖锐攻击。维克塞尔因其著作中的一个颇为常见的缺点而百思不得其解，即卡塞尔把别人的观点当作是自己原创的这个毛病。例如，维克塞尔写道“卡塞尔对瓦尔拉斯的借鉴显而易见是非常多的，但是他根本没有表示出应该表示的感谢，反而在整本书中连瓦尔拉斯的名字都没有提到”。^①从那以后，卡塞尔和维克塞尔的关系就彻底破裂了。

尽管有这些不同，但20世纪20年代瑞典经济学界的群星们对一些基础性的假设却达成了共识。他们都认为经济学应该为公益服务。他们还认为职业经济学家有责任表达民意。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通过在著名报纸或杂志上发表文章来唤起公共讨论。

总体看来，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毕业生都有可以利用的宝贵资源。但是他们并没有单纯依靠教授们给予的

^① K. 维克塞尔，“卡塞尔教授的经济学体系”，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演讲》中重印，第一卷，第225页。这个评论重现在《瑞典经济学2》中，由B. Sandelin编辑（伦敦：Routledge，1998年）。